

他从文献走来 ——读真柳诚《黄帝医籍研究》

廖育群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 100190)

(日)真柳诚(著):《黄帝医籍研究》, 东京:汲古书院, 2014年11月第1版,
607+26页, 6000日元+税, ISBN987-4-7629-6528-9 C3010

摘要 有关中医学基础理论奠基时期经典的研究, 历来与那些原著一样广受国内外医史界, 乃至历史、文化领域中许多学者的关注。真柳诚的新作《黄帝医籍研究》, 虽植根于这片屡被精耕的熟土之上, 却仍不乏精彩之处。据悉, 旅日中国学者郭秀梅已开始汉译此书, 故仅藉此文先对其研究结论概加介绍; 同时, 就贯穿于老友新作之字里行间的治学路径、所得之由略作铺陈; 最终归结于强调学术研究成果的终极价值, 在于成为修订教科书(通识教育)的基础, 并由此构成新研究的起点。

关键词 医学史 书评 真柳诚 《黄帝医籍研究》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441(2015)04-0488-10

“黄帝医籍”一词为《黄帝医籍研究》^[1](图1、2)一书的作者真柳诚自创, 意在昭示所论诸书在历史演进过程中, 皆有先后被冠以“黄帝”之名、称之为“经”的共同特征。然从更深层面讲, 则是由于作者在长期的文献考据性研究后, 注意到这些著作不仅在名称表象上具有如此共性, 且在内容与编撰意图、结构设计、传承与普及化过程^①等方面亦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从而促成其将这些古代医学经典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著作群”加以综合考察。并认为借助长期以来中日两国学者有关这些著作的深入、具体的研究成果, 已然具备终结某些争议、修正长期以来已成定说的错误观点、构建新的解释体系的条件。

收稿日期: 2015-08-31

作者简介: 廖育群, 1953年生, 湖北兴山人,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① 在与学友就此书价值展开的讨论中, 郑金生指出之一点至关重要: “由此使得‘黄帝医籍’的概念‘充实饱满’; 六种黄帝医籍之下, 大致分为概要、成书、传承、版本、结语五节。其中‘传承’这一块各章情况不同, 因此小标题变动也最大, 但都不离‘传承’意旨。从每书总体来看, 纵向梳理了从古到今每一种黄帝医籍演变的全过程, 最后总是落脚到现代通行的该医籍版本。在这一梳理→辨析→总结的过程中, 令人感觉到古本与今本的差异。这种差异对学者是有震撼力的! 它让人警觉: 应该怎样来看待经典。”(本文所引郑氏评论, 皆源自其致笔者的邮件, 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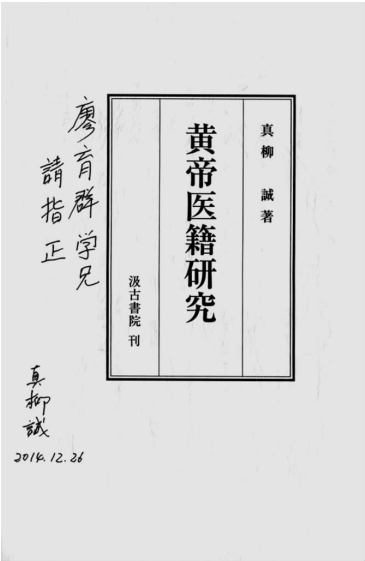


图1 《黄帝医籍研究》内封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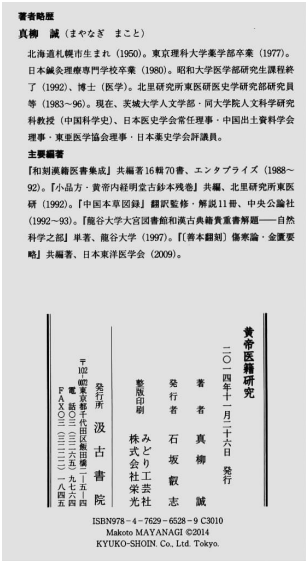


图2 《黄帝医籍研究》版权页书影

1 治学之路、所得之由

真柳诚(Mayanagi Makoto),1950年生于日本北海道札幌市,毕业于东京理科大学药学部;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就职于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现任茨城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教授。因其曾留学北京中医学院、可操流利中文进行学术交流,故与中国医史界始终保持着密切往来和良好的关系;当然,作者广为中国医史同道所知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对诸多中医文献精细的深入研究。但近些年来,其“学术形象”却似乎越来越不像长期以来所呈现的那样——耽心考据与书志研究。而这,恰恰正是我觉得于《黄帝医籍研究》之书里、书外,都值得关注之处。

1.1 文献调查之用

《中国科技史杂志》曾先后刊载真柳的两篇论文^[2,3]。如果说第一篇聚焦“江户时期中国医籍传日与翻印历史”的力作尚还只是一篇“文献调查”的话,那么第二篇则有本质的不同:论文作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曾往来于世界各大学、图书馆、研究所,对各国相关机构所藏近3万种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古医籍进行实地考察;但这种文献调查,并非仅是“书志”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而通过对中、日、韩、越四国之间,相互引进或引用他国医书、翻刻异邦古医籍的次数及时代等进行定量分析,论说“外来知识”在各国传统医学体系构建、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异同点等,体现出研究旨趣的某种转变。

至于《黄帝医籍研究》一书,又与上述论著有了更大的不同:仅就自创“黄帝医籍”这一概念而言,即已表现出其与所谓“书志”研究者视角、价值取向的差别。正如表1所示:当这些书名的衍变不再仅仅是被作为孤立的对象、加以文献研究式的考据时,则十分清晰地以另外一种方式显示出我们通常所强调的:“成书”与“成为经典”并非一时、一事;或者说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显示出所谓中国传统医学基础理论、至关重要的核心著作群是在何

时、以何种方式逐渐形成的。而这,又可以说是基于考据学家脚踏实地的立场,对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认定各种经典都是形成于先秦时代之“圣贤史观”强有力的否定。换言之,当详尽的“考据”成为总体把握各书,乃至俯瞰整个医学发展、知识传播脉络的基础时,“文献”、“考证”方面之研究与功夫的价值,才能得以最完美的展现;所谓“以史带论、论从史出”的治史原则,正是通过这种“有一分文献,说一分话”的治学方法得到具体落实。

表1 “黄帝医籍”的名称演变¹⁾

早期		后世	
名称(时代)	备注	名称(著录时代)	备注
《素问》(3世纪前期)	《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的早期名称与时代,皆系据成书于东汉前期的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序》。以下凡标为“3世纪前期”者,皆系据此	《黄帝素问》(500±年) 《黄帝内经素问》(1069年)	首见于南北朝齐梁间的全元起编撰注释的《黄帝素问》8卷本 北宋熙宁二年(1069)新校正本的正式书名为《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内题为《黄帝内经素问》,计24卷、77篇
《九卷》(3世纪前期) 《针经》(3世纪中期)	早期名称与时代,系据魏晋时期王叔和所撰《脉经》	《黄帝针经》(公元651年)	谓出“六五一年:唐永徽医疾令”,所据为丸山裕美子复原与比较“日唐医疾令”的多篇研究论文
《灵枢(经)》(公元762年)	唐·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原序》	《黄帝内经灵枢》(1155年)	宋·史崧《黄帝内经灵枢序》
《八十一难》(3世纪前期) 《难经》(公元239年)	《难经》之名首见于三国时期该书的吴·吕广注本	《黄帝八十一难》(公元656年) 《黄帝八十一难经》(公元945年) 《秦越人黄帝八十一难经》(1060年)	《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
《素问》+《灵枢》+《明堂》		《黄帝甲乙经》(公元523年)	梁·阮孝绪《七录》
《素问》+《灵枢》		《黄帝内经太素》(公元945年) 《黄帝太素经》(1345年)	《宋史·艺文志》
《明堂孔穴针灸治要》	《甲乙经·序》	《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公元945年)	

1) 本表名称、朝代,以及备注中所记首次引用或著录的书籍、年代,皆据《黄帝医籍研究》中的相关说明。

当然,如此强调“宏观”与“论说”的意义与价值,并无任何轻视或贬损各种细节考据工作之价值的意思。在当今人文学科已职业化的社会中,专事考据者当然不可或缺,其精深、专门化的学问亦足以令人敬佩。何况真柳本人这本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的专著,亦无处不是体现着作者几十年“考据”性研究的心路历程与种种所得,并非仅仅体现在这一最高层面的总结与概括上。例如,通过不同文本的比较,特别是那些早期传至日本、未因“翻刻”需要而“修订”^①的文本,以窥其本貌之端倪;尤其是在梳理各书流传、刊印,所谓“普

① 意谓凡属“翻刻”之文本,则不免有“修订”——改变原貌之嫌。此乃“书志”学家何以注重寻求“善本”的原因所在。

及”之过程时,对于历史遗存诸版本的全面了解,皆确属不可或缺。

1.2 另一种文献调查

就所谓文献的调查与研究而言,还需注意作者对于相关古籍、他人研究成果的广泛利用。表2所列为该书各章之后的“文献与注”的序号数,由于其中存在“文献”与“注释”共存一条之中、一条之下并举多种文献等情况,因而不过是略示参考文献数量之丰富的基本状况而已。然而藉此所欲提示的还有以下两点:

(1)“广征博引”已是当代论著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页之文,脚注篇幅大于正文的现象概不鲜见,然有时却不免流露出“为引而引”的痕迹。最为常见的表现是屡在脚注中列陈对某一问题有所论说的前人论著,但却不涉其观点如何,以及自己对这些观点的评价取舍。我曾就此询问中国大陆之外、惯取此种写作模式的一些同道,回答不外“与国际接轨”、“以免前辈不悦”或“质询文献查询不足”。全然不顾拜读“大作”者是否需要中断阅读、去所藏文献足够丰富的图书馆,才能知道那些引用文献说了些什么;更无从知道作者自己究竟要说明什么问题,以及对前人诸说究竟是持认同抑或否定态度。而《黄帝医籍研究》的广征博引则与此完全不同——不仅简明扼要给出他人的主要观点与论据,且表明自己的立场及理由。两相比较,当取何种“学风”想必毋庸再说。

(2)众所周知,日本的“汉方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具有同源异流的性质,长期存在以书籍为载体的知识传播途径;在日本不仅保存着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且至今仍是历久不衰的研究对象之一。作为日本学者,可资利用的文献范围得以广涉中、日两国的古籍和研究论著,此乃其“所得之由”重要因素之一。例如作者在论说今本《黄帝内经》(《素问》与《灵枢》)的成书时代时,引用了丸山昌朗(1917~1975年)“原《素问》成于东汉初期,原《灵枢》编纂于东汉中期”的看法;同时也引用了中国学者有关这个问题的独立研究与更具说服力的详尽分析。在论说《甲乙经》原序“非皇甫谧之作”时,所据亦是中国学者的贡献([1],284页)等。既然真柳之“所得”已然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那么对于大多不具备同等优势条件的中国学者来说,何不“站在真柳的肩膀之上”——直接利用其基于那些不易入手之日本所藏史料及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这也正是推荐阅读、利用此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2 “黄帝医籍”的传承研究

由于各研究对象所需关注的“问题点”并不相同,所以《黄帝医籍研究》实际采用的是分而论之的作业方式。然而无论是专业医史工作者,还是其他方面的史学、文化研究者,抑或仅属业余爱好,最当从中汲取的宏观性要点却在于:从总体上讲,这些著作皆有重编早期医学著作、构建相关知识完整体系的特点。因而读者在了解各书衍变具体脉络的基础上,还当进而关注这一特点形成的时代共性;尤其是当联系到思考时下中医教学与研究

表2 《研究》各章的参考文献与注释

章	篇幅	注释数
第一章《素问》	180 页	234
第二章《灵枢》	71 页	117
第三章《难经》	14 页	30
第四章《甲乙》	46 页	58
第五章《太素》	105 页	169
第六章《明堂》	171 页	146

所存在的实际问题。正如郑金生指出,此书的重要性与关键点在于:

现代中医教育普遍提倡学习经典,尤其是所谓“四大经典”——熟知医学经典是显示正统中医的必备条件。但对这些经典的“成书”与“成典”的过程,却未必尽人皆知;将今通行的“医学经典”(捆绑着陈旧的研究结论),作为某一时代医学“成就”代表的现象比比皆是。而真柳则将各黄帝医籍古今演变的轨迹从容勾画出来,明确今本与古本的差异,这对当今学习或运用这批古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当今的中医大多不了解古今的差异。就药物品种来说,许多药名虽然古今同名,但科属来源已大相径庭;古今用药剂量也大不相同;古今中医术语也可能名同实异……黄帝医籍也是如此。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人们就不会轻易以今通行本立论,更不至于奉若神明。

然详陈细节,实非此评介之文所应承担的任务——专业研究者理当自己读书。而在以下介绍中,之所以要耗费有限的篇幅,尽可能对各经典的基本情况稍加概约,意在免去非专业读者检阅原书之劳。

2.1 《素问》

本书为中国传统医学最重要的古典之一,对于后世的影响不可估量。尤其是自北宋被校订、刊行之后,众多医家将其理论应用于实践并加以发挥,构成了迄今中国与周边国家之传统医学的根干;注释、研究性论著层出不穷。日本江户时代的古方派排斥、攻击包括本书在内的黄帝医籍,以及源于这些著作的理论学说。因而在后世的汉方医家中存在着被忽视,仅被作为针灸学重要古籍的倾向。然而遍观中国医学的形成与发展,乃至除日本外之周边国家的医学史,本书的研究实属不可或缺。([1],11页)

作者对于《素问》之历史地位与重要性概约,包含两个值得关注的要点。一是在充分肯定该书对于中国及周边国家传统医学之重要价值时,特别指出了日本“汉方”医学的特殊性。这一差别,实可作为深入思考“同源”之中日两种传统医学知识体系何以会“异流”的切入点。当然,这种植根于“比较”上的深入思考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即至少也要对日本近世的“后世”、“古方”、“折衷”三大医学流派有所了解;同时,这也是真正能够走出“中医”山林、反观其景色全貌的必要条件之一。其二,则是指出该书原本与形成广泛影响与“刊本”间的复杂而密切的关系——即所谓“成书”与“成为经典”间的区别。两种表述虽可谓殊途同归,但路径却有所不同:《黄帝医籍研究》的作者系将着眼于经典之“普及化过程”的文献研究,用于医学“总体发展历程”的把握;与之相应,所谓医史研究者只要不受“圣贤史观”的束缚,同样可以秉承“进化史观”的指导思想,对于相关史料作出同样的分析。由此亦可看出所谓“史学”与“哲学”两种视角间并非绝对不能相容,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就有关《素问》的论说而言,最值得关注的一点在于:作者采用了近年来有关该书并非《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之“《黄帝内经》十八卷”之半壁的观点,由此也就认同了其成书当在东汉时期:

集合先秦以来所积累之医学知识与记录的各种文献,看来就是西汉的“黄帝内经、外经”及“扁鹊内经、外经”、“白氏内经、外经、旁篇”吧。可以认为:经过对于这些基础文献的选择取舍、整理,至东汉的一世纪前半期《素问》之书名及其核心内容、至

二世纪前后《九卷》之书名及其核心内容始见成立。与西汉具有如此密切关联的两书名既未冠以“黄帝”、亦未冠以“内经”之名,说明当时的原编者们完全没有将其与“黄帝内经”联系在一起的意思。([1],160页)

然尽管这样的看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严肃学者所认同,但作者亦同样指出:“《素问》+《灵枢》=《黄帝内经》之说,不仅在当代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皆已成定说”([1],6页)。故考虑到既要忠实于史实,又要兼顾世人业已习惯的通行说法,所以在我的论著中凡遇需要合称概指《素问》与《灵枢》两书时,则采用“今本《黄帝内经》”的表述方式。

2.2 《针经》与《灵枢》

构成今本《黄帝内经》之半壁的《灵枢》,与《素问》有许多相同之处——皆由“九卷”构成,皆以“黄帝—诸臣”问答的形式行文,皆与此前的医学知识、文献传承具有某些联系;同时,其原为一部独立著作的属性亦与《素问》相同。但“后世将其与西汉的《黄帝内经》联系在一起,如此简单化地处理先秦、西汉至东汉的文献传承,是毫无道理的。”([1],246页)

由于宋代以前《灵枢》存在远较《素问》复杂的多途流传问题,故《黄帝医籍研究》的作者在这一章中将关注的重点置于其名称演变;以及源于同一祖本的内容,如何以不同名称之文本流传的问题上^①。考证的结果是确认旧称《九卷》、《针经》者,与《灵枢》属同一著作,或谓源自相同的祖本;内容上的多寡之别、文字差异,显示了早期传本的不同,以及宋代校订本的综合与考订加工。

然而从“医史”研究者的侧重点出发,审视早期《素问》与《灵枢》传本状况之不同,是否可在这样的精细文献考证之上有另一方面的思考呢?即由于后者的内容相对而言富含“实用”的针灸技术,因而也自然就会更多受到医家的关注、形成了更多的传抄需求;而基于实用的传抄,不同于文献复制,取舍由己则自然会形成各种所谓“不全”之本。

2.3 《难经》

《难经》与《素问》、《灵枢》一样,亦由81章构成,故旧称《八十一难》;同样采用问答体,但没有具体的问答者,仅按数字序号依次称为“某难”,且各章文字较短。过去,研究者大多认为该书属于解说今本《黄帝内经》中疑难问题的著作,但精细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其中所讨论的问题不仅未必皆见于《素问》与《灵枢》,且有“自成体系”的倾向。例如,为使脏腑的阴阳属性与数字的阴阳奇偶关系相合,该书提出五脏中的“两肾”为“两脏”(左肾、右命门),故实为“六脏”;而六腑中的“三焦”因“无形”,故实仅“五腑”。又因全书是以“五行”说为主体说理工具,故不仅构建了诸如“伤寒有五”等各种疾病的分类纲领,且将各经脉肢端的5个穴位配以五行属性、阴阳相关经脉间穴位具有生克关系的“五输穴”体系。凡此种种,不仅可作为观察东汉时期传统医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且该书在理论方面提出的“命门”、“肾间动气”、“三焦无形”等一些新概念对于后世医学的发展亦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① 所列书名(按时代先后)包括:《九卷》、《针经》、《针经九卷》、《黄帝针经》、《九卷(经)》、《黄帝针经九卷》、《灵枢(经)》、《黄帝九灵经》、《黄帝九卷》、《黄帝内经灵枢》、《内经灵枢经》、《黄帝九虚内经》等。([1],195~197页)然因古代行文不似现代规范,只要做到“不失本意”即可;又无句逗,所以并不能认为这些都是不同书名或不同传本。尤其是如《针经九卷》之“九卷”究属书名构成部分,抑或卷数;《九卷(经)》之“经”字,是书名部分,还是“尊称”之义,皆难以确定。

然真柳对于该书的重视程度明显较弱,这一章的篇幅不过 14 页,所引文献仅有 30 条。基本内容也多属综述中日两国前贤的观点,如:认同该书成于公元二世纪中后期,属一人或某一流派的作品,否定了作者为先秦名医扁鹊的说法而已。

2.4 《甲乙经》

长期以来中国医史界通行的说法是:这部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为西晋皇甫谧摘录《素问》、《灵枢》及《明堂经》而成。而真柳认为:该书的作者、成书时代、书名之义,乃至迄今之历代文本传承等问题,实际上均未解决。分述如下:

(1) 书名与卷数:古籍在后世的编撰过程中出现卷帙变化乃常见之事,本不足为奇;但因《甲乙经》的卷数关系到“书名”的意思,所以需要加以考证。概言之,因唐代《外台秘要》引文中见有“出庚卷第七”、出“第八辛卷”、“丙卷云”等语;《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卷”,故中国医史界一直沿袭该书原为 10 卷,故以天干之“纪”(甲乙)作为书名的说法。至于说何以在唐代(公元 659 年)已被改编成传世的 12 卷本,则不得其详。而唐代改编、卷帙变化却为当代研究者提供了这样一个线索,即:言其“为十二卷”的所谓“自序”,实乃后人之作。就书名取意而言,真柳认为日人浦山久嗣于 2013 年给出的另一种解释,亦未必没有道理。即:《说文解字》“穴”部下有“穴甲”(入脉刺穴)和“穴乙”(空、窍)两字,故书名“甲乙”似属“针刺孔穴”的隐喻;甚至可以推测该书原名或为《穴甲 穴乙经》([1],279 页)。

比较有关书名之意的两种说法,我倾向于沿着浦山极有新意与启发的思路。盖因对于一位颇具文化修养的作者而言,“秀文采”乃是萌生于深厚文化基础之上的惯见心理追求,故理应是取“穴甲 穴乙”二字作书名为因,而卷数之“十”不过是或有意、或无意的暗合而已。

(2) 编者与年代:真柳在详列早期说到此书者,概未见言及作者为何人;自《旧唐书》始见称“皇甫谧撰”的历史文献记载状况后,又就其写作方式与汉晋时期的若干医籍加以比较,得出如下结论:

《甲乙经》之序例及本文的编者,无疑是东晋、大约四世纪后半期的无名氏。而无名氏“原序”中,构成托名西晋皇甫谧之“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方治要皆浅近”一节及修辞,乃后世所加。即从《五行大义》(581)至杨玄操《集注难经·序》(621—630)之间。([1],286 页)

2.5 《太素》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杨上善注”,但南宋后亡佚不存。此书于中唐时期东传日本后,至 14 世纪末或 15 世纪初亦同样不再流传;然 19 世纪 20 年代,却在仁和寺中发现了《太素》古抄本的残卷。19 世纪末杨守敬从日本携归抄本 23 卷,中国学者才得以重睹此书之貌,进行整理研究。

《太素》是现知历史上第一次以类书形式重编今本《黄帝内经》内容的著作,故其价值主要在于可以作为校勘《素问》与《灵枢》的一种文本。但中日两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却均曾发表过一些难以成立的观点,例如:以为《汉书·艺文志》阴阳家中所著录的《太素》即是此书,或认为《太素》才是《素问》、《灵枢》的原形。真柳除认为这些观点皆属不可能,并概约中日

两国学者对其文献学方面种种价值的共识^①外,还围绕该书作者展开了下述论说。

(1)作者的姓名与生卒年:认同中国学者有关西安郊外近阿房宫处农家所藏《墓志铭》刻石“非伪撰”的考证^②,由此确定杨氏的生卒年为589—681年。这与尽管现行印本题为“隋·杨上善撰”,但学界早已认同杨氏当为初唐之人的论说相一致。有意思的是:据该《墓志铭》,其姓名并非“杨上善”,而是“讳上,字善”。如此,《日本国见在书目》(公元891~897年)“《内经太素》卅”下,何以著录为“杨上撰”的问题也就得以冰释了。但真柳又认为:因其义盖取《老子》“上善若水”,故不仅他本人已有“连记”,今后亦当写作“上善”以遵从其本人的意愿([1],334~338页)^③。

(2)书名中的“内经”之称:真柳敏锐地注意到:在杨上善之前,《素问》、《灵枢》乃至相关的《甲乙经》、《难经》,虽然已见冠以“黄帝”之名,但称前两种为“内经”不过仅是《甲乙经·序》中有此推测^④而已。换言之,径以“黄帝内经”作为书名,实“始于杨上善的两书”;就其心理、动机而言,可谓“通过类编《素问》、《灵枢》,将其想象中的前汉之‘黄帝内经的本义’,具体化为《黄帝内经太素》”([1],329页)。而所谓“两书”的另一种,则是指下述杨氏所编撰的《黄帝内经明堂》。

(3)关于《太素》属杨上善“自撰”(类编)并加“注释”;抑或是取已有文本,仅作“注释”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长期以来医史、文献两途研究者皆有所关注的话题。真柳宗中国学者徐春波之论^[4],认同该书为杨上善所撰并加注释的观点([1],326页)。

2.6 《明堂》

《明堂》原本早佚,后世仅可通过《甲乙经》等的引用,了解到该书的内容主要是按照身体的部位记述针刺穴位;成书时代约在2世纪中后期。有关古本《明堂》的辑佚,和杨上善《黄帝内经明堂》的研究,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真柳高度评价了黄龙祥《黄帝明堂经辑校》^[5](图3),此乃窥古本《明堂》之概貌的路径。而欲宏观“黄帝医籍”,则需参考《黄帝医籍研究》中的论说。例如,真柳基于篠原氏所言“《素问》王冰注引有《黄帝中诰图经》、《内经中诰流注图经》等,此等看似‘孔穴流注图’的书已冠上‘黄帝’、‘内经’之名”的论说,认为杨上善之所以名其为《黄帝内经明堂》,乃是基于上述与《黄帝内经太素》命名相同的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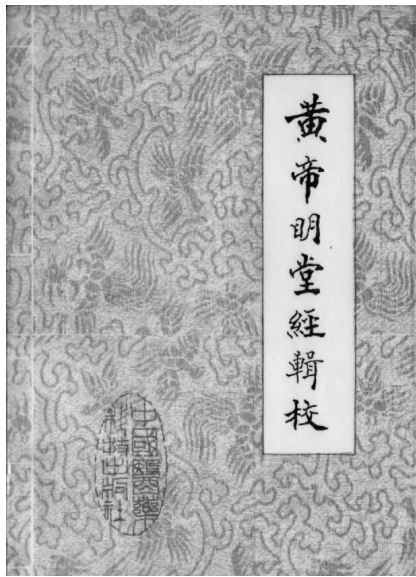


图3 《黄帝明堂经辑校》封面书影

- ① 例如:书中未见引用《素问》“运气七篇”、亡篇“刺法论”、“本病论”之一语,故可证这些篇章皆为后世掺入。
- ② 所据考证之论为张固也、张世磊《杨上善生平考据新证》(《中医文献杂志》,2008年,第5期,第1~4页);该墓志铭收入《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③ 真柳在邮件中就此又补充了一条他认为非常重要的理由:杨氏身为太子师,作为弟子者当以“名讳”相称,但太子对他怎么叫?由于“上”是特指皇帝,“所以没办法,在宫廷里例外地通称‘上善’了。”
- ④ 被作者认定为无名氏之作的《甲乙经·序》中有言:“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

杨上善《黄帝内经明堂》虽已大部分亡佚,但日本学者据该国尚存的该书卷一抄本(图4),大致推测出全书13卷的结构,即:依《灵枢·经脉篇》之序,从“肺”至“肝”(十二经脉)各为一卷;“奇经八脉”为一卷([1], 586页)。我以为纵观古本《明堂》,和《甲乙》之吸纳、杨氏《黄帝内经明堂》改编,可以给出如下要约:

古本《明堂》,体现了“针灸”作为一种实用治疗技艺的基本属性与特征,故只论穴位,不言经脉。《甲乙经》的特点在于汇编了《素问》、《灵枢》中与针灸疗法有关的理论性内容(经脉),以及《明堂》有关穴位的知识。《黄帝内经明堂》则进一步改《甲乙经》之“和”而为“合”——按“经脉”统摄“穴位”。这种表述方式,与当代《针灸学》教科书相一致。但为什么仅达到“和”之阶段的《甲乙经》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而臻于“合”之水平的《黄帝内经明堂》,以及类编性质的《太素》反而皆亡佚不存?则尚待今后学者的继续研究。



图4 江户时期抄本《黄帝内经明堂》卷1 首页

3 “常识”与新的“起点”

库恩所著《科学革命的结构》,这部写于五十多年前的科学哲学名著,讨论的虽是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演变轨迹,但其中所言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史学”。这是因为,立足“科学”一词最基本的含义——“分科之学”、“系统的知识”,那么“史学”这一学科的形成不仅同样符合这一定义;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亦同样存在某些研究的“范式”、从“常规”经“革命”而形成“新常规”的变化;尤其是其中屡屡提到“教科书”的作用与重要性,以及“最新研究成果”应当经此渠道转化为“常识”的论说。

成就被记录在经典著作中,更近期的则被记录在教科书中。([6],1页)

可以这样说:古代的科学“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恰恰在于其记录了代表着当时(历史上某一特定时点)最新、最高水平的知识;甚至是对这些知识的包揽与总结。诸“黄帝医籍”,乃至《本草纲目》等多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成之作,亦同样因此而获得了“经典”的地位。然随时代衍降,科学新知识的“总结”方式却发生了变化——所谓科学家的贡献往往体现在某一具体事项,且这些“新知识”还需历经时日的检验、群体的认可;因而吸纳这些研究成果,构建“分科之学”的“新知识体系”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教科书”的使命。正因如此,所以库恩才会就知识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革命几乎是不可见的”问题解释说:“教科书隐瞒了革命的作用”,因为人们对于这些新知识的了解,“都出自同一个权威性的来源”——教科书([6],123~124页)。而史学研究与上述库恩之论的可类比性即在于: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对于“黄帝医籍”中某一问题的研究,恰如自然科学领域中逐渐获得点滴突破、新知识不断增长的过程;而当积累达到足够丰富,并显示出并非一家之言、业已获得“群体认可”时,则理应进入总结、构建新的解释体系的阶段。正如真柳所

言:借助“前人已相当丰富之研究基础,加之当代信息化的便利检索条件”,或许已经到了可以“为以往之争议画上休止符”的时候([1],7页)。

然而这个“休止符”是否应该仅仅停留在《黄帝医籍研究》这样一本个人学术之作上呢?如果当代的中国医学史教科书始终保持着库恩所言“常规科学”的面貌——坚实地建立在过去的研究基础上,吸引着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其他研究模式;作为这个共同体公认的实践基础,暗暗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并始终以旧的范式在研究中发挥着引导作用([6],9、58页),而不是通过教科书不断将新的研究成果变成“常识”,那么后来者便永远要从一个早已过时的平台起步,重复着那些早已被研究者反复论说过的旧话题。因而这个“休止符”必须画在当代新版的“中国医学史教科书”上,构成一个未来研究的新起点。这难道不正是医学史教科书、执医史教学为业者,乃至肩负者人才培养任务之“中医药大学”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吗?

参 考 文 献

- 1 真柳誠. 黄帝医籍研究[M]. 东京:汲古書院,2014.
- 2 真柳誠. 日本江户时期传入的中国医书及其和刻[J]. 梁永宣译. 中国科技史杂志,2002,(3):55~77.
- 3 真柳誠. 中日韩越古医籍数据的比较研究[J]. 郭秀梅译. 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3):5~18.
- 4 徐春波. 杨上善与《太素》类编的关系考[J]. 中华医史杂志,2001,31(1):13~16.
- 5 黄龙祥(辑校). 黄帝明堂经辑校[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87.
- 6 (美)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金吾伦,胡新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Book Review of *Research on Medical Books Related to Huang Di* by Makoto Mayanagi

LIAO Yuqun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 CA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classic works of the foundational period of the basic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always, like the books themselve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s well a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lthough *Research on Medical Books Related to Huang Di*, a new work by Makoto Mayanagi, is another book on this mature topic, it is not without its excellent points. Guo Xiumei, a Chinese scholar, has already begun to translate this book, so this review is merel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s research conclusions. In addition, this review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paths and methods of this book. Finally, the review concludes that the ultimate value of the results of academic research is to be the basis for the revision of textbooks or general education, and thus form the starting point of new research.

Key words history of medicine, book review, Makoto Mayanagi, *Research on Medical Books Related to Huang Di*